

# 汉代骚体抒情诗主题与文人心态

## ——兼论骚体赋的意义及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赵敏俐

**提 要** “骚体抒情诗”包括收录于王逸《楚辞章句》中汉人模拟楚辞的作品和汉人以“赋”命名的骚体作品,这些作品是汉代文人的个体抒情诗,本文的内容,就是要对汉代骚体抒情诗的时代主题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并由此来解剖汉代文人心态。

**关键词** 骚体抒情诗 汉代 主题 文人心态

在汉代文学史上有两种特殊的文体,包括收录于王逸《楚辞章句》中汉人模拟楚辞的作品,汉人以“赋”命名的骚体作品两大部分,一般人把前者称之为“汉人拟楚辞”,后者称之为“骚体赋”。这两种文体都是汉代文人的创作,虽然不以“诗”命名,实则是独具文体特色的汉代文人抒情诗,由于它们都与楚辞有关,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之为“骚体抒情诗”。它不仅是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近人治汉代诗歌,由于把它们排除在外,因而在研究中出现重大疏漏,由此也产生了重大的认识偏颇。因此,深刻认识骚体抒情诗在汉代的存在状况,骚体抒情诗的丰富内容与独特艺术成就,对于全面把握中国诗歌史,尤其是文人的心态史与文人诗歌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一 悲士不遇与生不逢时

这是汉代文人骚体抒情诗中最核心的抒情主题,早在贾谊的《吊屈原赋》中就首开其端,作者以凭吊屈原的方式抒写自己的不幸: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

至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直接发出了更为深沉的感叹:

呜呼,嗟乎!遐哉藐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皇皇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贾谊、董仲舒都是汉代著名文人,也都曾经位居较高的官职。如贾谊二十几岁就官至太中大夫,以后又出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以治《公羊》学为博士,汉武帝时以应贤良诏而得到汉武帝的提拔,先后任江都易王相与胶西王相。但他们二人却都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沉重感受,并将之诉诸于诗歌,发哀伤之情。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来讲,西汉自文景时代即逐渐步入经济发展的繁荣期,汉武帝时代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盛世,贾谊、董仲舒都生逢其时,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心理呢?这需我们从几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是从汉代文人心态方面来讲,“悲士不遇”、“生不逢时”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必然表现。如东汉文人王充所言,作为一个受过儒家传统教育的汉代文人士子,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是能知“大道体要”、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鸿儒”。在这方面,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人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有很高的人生志向。贾谊年少才盛,深得汉文帝赏识,二十余岁就官至太中大夫,为文帝身边最受信任的重臣,可谓得志。他认为实现自己宏伟政治理想的时机已到,于是就竭尽全力为国家的兴盛出谋划策:“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廉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但是贾谊的所做所为却触犯了一大批先朝老臣的利益,“绌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给他加上一个“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罪名,迫使汉文帝不敢委之以重任,把他从朝廷调离,去做长沙王太傅。可以想见,当贾谊被贬之时,他的心情有多么悲愤。因为贾谊并不是一个庸俗文人,而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干得到了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眼看着自己所规划的宏伟政治蓝图就要付诸实现,却硬生生地被一群恃功自傲、碌碌无为的庸才排挤出朝廷,让他再也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这自然也就意味着他的最高人生理想今生再也难以实现,是对贾谊从政生涯最沉重的打击,面对“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现实,他不能不产生怀才不遇,“逢时不祥”的痛苦。

与贾谊的年少气盛不同,董仲舒是一个非常成熟沉稳的学者,也同样有“怀才不遇”的感受。他早年因治《公羊》学而出名,在汉景帝时为博士,他的理想,就是想把经过他改造过的《公羊》学理论运用于治国的实践。汉武帝下征贤良之诏,董仲舒数次应对,提出了“更化”的治国方略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但是汉武帝并未把董仲舒提拔为身边的近臣,而是让他去做江都易王的相,这显然没有达到董仲舒的最高期望,不能不让他有些失望。但董仲舒还是竭尽全力,以礼匡正易王,希望汉武帝能够认识到他的才干。可惜汉武帝还是没有重用他,董仲舒于是就想寻找新的机会。此时,正巧发生了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就推详灾异,准备上书,没想到草稿先被主父偃看到,心生嫉恨,就把他的书偷来上奏汉武帝,巧借他人之手对他进行政治陷害,结果汉武帝大怒,将董仲舒判了死罪。虽然以后汉武帝下诏赦免了董仲舒的死罪,但是这件事却给他重大的打击,彻底浇灭了他的政治热情,使他知道了官场的险恶,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言有关国家的灾异之事。但即便如此,董仲舒还是险些再一次被害。当时有另一位大儒公孙弘,虽然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但是却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因而得到汉武帝重用,位至公卿。董仲舒瞧不起公孙弘的所作所为,公孙弘嫉恨他,就想设法陷害他,上奏汉武帝,让董仲舒再去胶西王相。胶西王也是武帝兄长,素以骄纵出名,几位二千石的地方官都被他所害。胶西王虽然敬重董仲舒,但是董仲舒却不免有时时获罪的恐惧之心,不久就以病为由而辞官,从事著述,终老于家。可以想见,董仲舒作为汉代著名大儒,同样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对汉武政治寄托着满怀的希望,他竭诚尽智的上书汉武帝,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而且又先后受到主父偃、公孙弘的两次陷害,差一点没有丢掉

自己的身家性命。面对着这样的人生经历,他怎能不发出“悲士不遇”的感叹!

其次是从汉代皇权官僚政治方面来讲,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当真正有理想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产生“悲士不遇”、“生不逢时”的感叹。和先秦宗法制社会相比,封建官僚政治有它进步的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为普通的中下层士人创造了更多的仕进条件。“两汉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途径很多,如军功、任子、赏选等,但主要的是征辟和察举。”“征辟是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名士任官”,“察举制则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sup>①</sup>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许多优秀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走上了国家的各级管理岗位,这与先秦贵族的世卿仕禄制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一个优秀的人才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重用,还要受各种复杂因素所左右。帝王本身的好恶,官僚之间的倾轧、政局的变迁以及其它偶然的因素等都可能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贾谊、董仲舒的遭遇,在客观上也说明了汉代的皇权官僚政治还存在着诸多弊端,真正的人才有时候不但得不到重用,而且还会受到各种迫害。贾谊受谗于前朝的老臣,那是一群居功自傲而无所事事的人物,谁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把谁拿掉。董仲舒受害于他的同类,公孙弘和主父偃则是汉武帝所宠信的大臣,他们善于用各种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然后再假皇权之手来谋私获利。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通病,汉朝人就已经早有认识。如刘向评价贾谊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其评价董仲舒时又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sup>②</sup>可见,贾谊、董仲舒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汉朝就获得了文人的同情。

贾谊和董仲舒虽然有生不逢时之叹,但二人毕竟还有很高的官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身体也没有受到摧残。司马迁本来怀有一腔忠心,为李陵之事开导汉武帝,不想却触怒了汉武帝而身受腐刑,在狱中又受尽了种种非人的虐待,他的《悲士不遇赋》里面所表达的感情也就更为激烈: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颡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矣。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

司马迁本来也是胸有大志之人,他曾经为自己出身太史之世家而自豪,为自己生于汉武帝盛世而振奋,并发誓上承孔子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一部可以与《春秋》媲美的史著。但李陵之祸不但让司马迁认清了皇权的本质,也对自己在皇权之下的个人身份之卑贱和个体人格被随意践踏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

① 房列曙:《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按关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可参看该书第2章《秦汉的人才选拔制度》,第29—68页。

② 以上分见班固:《汉书·贾谊传》、《董仲舒传》“赞语”中引。

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於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於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司马迁在这里拿自己卑微的身份与王侯将相比,有为自己的受辱进行宽解之意。但是在这里无意中却说出了两条真理:第一、在封建皇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奴才,都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对象;第二、在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不管你有多大功勋,多老的资历,一旦惹恼了皇帝,便会有性命之忧,便会受尽各种污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许多王侯将相,无论以什么样的原因得罪了皇帝,往往都会引颈自裁,在很大的原因上都是为了免受污辱。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下来,是因为他还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同时这正说明司马迁清醒地认识到了人格的尊严,认识到封建专制社会毫无人性的一面,他的《悲世不遇赋》因此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伟大的人格觉醒。

汉代的文人,特别是对于西汉的文人来说,他们感叹悲士不遇,同时也在感叹生不逢时。所谓生不逢时,第一种意义是生不逢三代盛世。那些才华横溢的汉代文人们,无不把自己期许为伊尹、姜尚、管仲之类的人物,他们感到最遗憾的,自然是没有遇见像虞舜、成汤、文王那样的明主。生不逢时的第二种意义,是汉代文人感叹自己没有生当战国之际,因为那是一个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士阶层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一些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遍天下延揽人才,于是便形成了“礼贤下士之风”和“布衣卿相之局”。但是汉代社会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文人们再也不可能平步青云,由布衣而直接为卿相了。如“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东方朔于是上书自荐,但汉武帝仅让他待诏公车,给他一点薄薄的俸禄,根本就不见他。后来,东方朔以其滑稽多智而得到汉武帝的喜爱,也不过是做一个执戟殿下的侍郎而已。所幸东方朔对此已经看得很透彻,认识到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道理,对战国与西汉两个时代士阶层的不同处境作了很好的分析。东方朔认为:战国之时,兼并日趋激烈,“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今则不然。”早已是“时异事异。”一方面是人才济济、难以升迁;另一方面你还要异常小心,“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稍不谨慎就会被“卑之为虏”、“抑之在深泉之下”。<sup>①</sup>所以,东方朔在《七谏》中一再感叹:“齐桓失于专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晋献惑于郤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秋草荣其将实兮,微霜下而夜降。”东方朔常自称是“避世于朝廷间者”,并在酒酣之际作《据地歌》:“陆沈於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sup>②</sup>由此可见,东方朔特别向往盛行礼贤下士之风的战国时代,在他的内心深处,自然也隐藏着生不逢时的无限感慨。

由此可见,汉代社会虽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为文人士子走向仕途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却异常艰难,他们与汉代文人实现理想的愿望还相去甚远。在封建社会里真正得志的文人并不多见,故悲士不遇、生不逢时便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文人诗歌的抒情主题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哀吊》曰:“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

① 以上所引论俱见《汉书·东方朔传》。

② 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

哀 盖首出之作也。”《才略》篇中又说“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刘勰把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赋作称之为“理哀”与“告哀”之作，见解深刻。当然，以抒写悲士不遇、生不逢时为题材的汉代骚体抒情诗，也因此而具有了典范的意义，并成为后世文人诗中常见的主题。

## 二 全身远祸与超越世俗

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来讲，如果仅仅是生不逢时，不遇明主，自己的理想追求得不到实现，平平安安地生活也就罢了，但是只要一踏入皇权政治的门槛，一进入官僚政治的围城，伴随他们的，往往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性命之忧。上引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列举的汉初韩信等人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事实。董仲舒两度被害，一次入狱，司马迁身受腐刑，更是摆在文人面前的遭遇。所以，超越世俗、全身远祸，也是汉代骚体抒情诗的另一重要主题。本来，安于贫贱，与世无争，远离世事，当一个自由的隐士，这是战国时代的庄子给世人指出的另一种生活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安贫乐道”。“乐道”需要付出“安贫”的代价，也意味着抛弃儒家王道政治的社会理想，所以在战国时期，庄子的这种思想为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儒家文人士子所不取，孟子、荀子等都不赞同庄子的观点。但是汉代的文人士子们却不同了。他们本来是以儒家学者的身份，带着昂扬向上的治国理想走向仕途的，但是当他们步入仕途以后，皇权的高压与官场的倾轧却使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老庄思想的真谛，并将其化为解脱自己现实苦闷的新的人生哲学。所以，早自汉初起，老庄人生哲学在儒家知识分子那里就像一股潜流一样在暗暗的涌动着。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心情郁郁而伤悼，遇鵬鸟进宅，自以为命不得长，于是作赋以自广。在赋中，贾谊先以老子祸福相依之论来对自己目前的处境进行化解：“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夫差以败；粤栖会稽，句践伯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传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既然如此，自己目前虽被贬谪，又安知非福？接着，他又用庄子人生若浮、真人无名的理论来反思自己以往的人生价值追求的无意义：“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亡不可。”既然把人生都已经看透，那么所谓的人生荣辱、鵬鸟进宅又算得了什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当此之时，我们看到的贾谊，与那个积极进取的贾谊简直判若两人。<sup>①</sup>当然，贾谊并没有真的解脱，仍然积极参与政事，他后来又为梁怀王太傅，并且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梁王身上，不幸的是梁王坠马而死，而贾谊也因此郁郁而终。但是通过贾谊的例子我们却可以看出，道家全身远祸的思想，已经成为汉代儒家知识分子思考其生存状况的重要理论指导。

促使汉代文人进一步接受老庄哲学的原因是他们在从政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政治险恶。在这方面董仲舒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董仲舒为人正直，没有任何害人的心计，“正身率下”，他可以用礼谊匡正以骄纵闻名的江都易王，受到易王的敬重，在侯

<sup>①</sup> 贾谊在上疏陈政事时曾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见《汉书·贾谊传》。

国取得很好的政绩。但是他却两度受小人的暗算,让他深深感到从政的风险。他在《士不遇赋》中一再感慨“屈意从人,非吾徒矣”;“皇皇匪宁,只增辱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犹怀进退之惟谷,彼实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为黑”。于是他考察历史,“观上古之清浊”,发现在那个时代,同样是“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最终他不能不产生全身远祸之思,“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

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尚且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其他文人产生全身远祸的思想,也就更合乎自然。扬雄就是其中的一位。《汉书·扬雄传》说: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奢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可见,扬雄在当时的汉代人当中属于另类,他在政治上没有很高的理想,也没有物质上的奢望,不贪图贵,不也嫌贱贫,读圣贤之书、好学思深是自己的最大爱好,而且特别喜欢辞赋。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他的蜀郡同乡司马相如,以模拟其作品为乐。总之,扬雄是个远离世俗的大儒和文士,四十岁之前他都没有出蜀,对汉代官僚政治没有切身的感受,也没有全身远祸之思。但是到了四十岁以后,他终于耐不住寂寞而远游京师。到了长安之后,他的生活态度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不关心政治到对政治充满了热情。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他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继承《诗经》中贵族诗人关心时政的美刺传统,先后做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四篇大赋,一方面表达他对汉成帝的颂美,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委婉的批评。可惜的是汉成帝并没有因此而重用他,只是让他做了一个“给事黄门”的郎官,这让扬雄大失所望,同时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眼看着与自己同为郎官的刘歆、王莽等人逐渐高升,而自己却久居下僚,时至哀帝时董贤等专权,扬雄不得已转而又走进书斋去研究它的《太玄》。对此,他曾受到别人的嘲笑,于是作《解嘲》,其中对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进行了自我解释: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

表面看来,扬雄在这里是对自己所钟爱的赋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认为它达不到讽谏帝王的目的,而赋家的身份也类似于倡优,被人瞧不起,不是正人君子之所求,于是自己转而作《太玄经》,希望借阐发天地之大道来传世。但是看《汉书·扬雄传》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扬雄之所以历成、哀、平三世而不得升迁,这与他不会阿谀奉承苟合取容的性格有关。汉成帝时只会献赋,被人瞧不起;汉哀帝时,董贤专权,那些卖身投靠的人也都升了官,“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可是扬雄却不去巴结奉承,自然不会受到提拔;到王莽篡位时,利用符命之说为自己制造舆论,“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可扬雄还是不肯这样做,因而照样得不到重用。更为可悲的是,王莽当政之时,他对政治已经淡漠,一心在天禄阁校书,可是却因为刘歆父子的连累而误被拘捕,情急之下

从楼上跳下,差点摔死。幸亏王莽查知刘歆之事与扬雄无关,他才免去一场灾难。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受到京师人的嘲笑:“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

由此我们再来看扬雄的《太玄赋》,也就理解他何以会有这样的玄远之情了。汉哀帝时,扬雄曾耗费心思,仿效《周易》而作《太玄经》,阐发自然之道。其《太玄赋》既以“太玄”命名,当作于《太玄经》之后。赋之开篇即言:“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可见,此赋所依据的乃是《易》之“损益”、《老子》之“依伏”之理,来省察现实人生中“忧喜共门”、“吉凶同域”的现象,进而抒写自己淡泊名利,全身远祸的情思。请看赋的最后部分的“乱”辞:

甘饵含毒,难数尝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鸾凤高翔,戾青云兮。不挂网罗,固足矜兮。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

赋中连续列举了李斯、晁错、屈原、伯姬、伯夷、叔齐、伍子胥等七人不得善终的史实,责备这些聪明过人的人过于执著,而不明白祸福相依、吉凶同域的道理。全身远祸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现实社会中超脱而求得自由,不执著于世俗的名和利。

从此赋中可见,扬雄所阐发的“玄”学理论,乃是杂取《周易》、《老子》与儒家的修养性之学而成,其核心就是要知道祸福相依的道理,在现实人生中要随时做好全身远祸的准备,并以之作为自己处世的法则。而全身远祸的一个最佳方法就是超越世俗,这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标志着汉代文人全身远祸心态的新发展。

汉代文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全身远祸的心态,是与汉代社会政治的复杂性分不开的。皇帝的专权或懦弱,皇室内部的争斗,权臣的结党营私,外戚与宦官的弄权等等,异常纷繁地纠缠在一起,这让很多文人感到从政的危险不知何时就会降到头上,因而,全身远祸、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很多文人的选择。两汉之际的冯衍,就颇有代表性。据《后汉书·冯衍列传》记载,“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西汉末大乱,从刘玄起兵,曾为尚书仆射鲍永手下的立汉将军。玄死,从光武帝,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以后阴兴、阴就以外戚贵显,敬重冯衍,冯衍遂与之交结,官司隶从事。光武帝惩治西京外戚宾客,冯衍因为与外戚过从甚密而得罪,免官归家。建武末年上书自陈,仍不被起用。汉明帝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冯衍的《显志赋》大概作于汉光武帝末年上书自陈不被重用之后,内中多有怀才不遇的牢骚。其自序云:“顾尝好倜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赋中作者追怀远古,睹物思人,反复申说世俗之险恶,好坏之难分,“悲时俗之险厄兮,哀好恶之无常”,“纷纶流于权利兮,亲雷同而妒异”,“愤冯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在赋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 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於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倜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

作者通过忆古思今,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孔丘知命,老聃贵玄,把名与身相比,还是自身的生命最有价值。既然如此,要功名利禄有何用处?还是像庄周那样辞显相之位而垂钓,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远离尘世而高飞,做一个与世俗不同,安贫乐道之人吧。<sup>①</sup>冯衍本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他因为怀才不遇而终生不得志,故赋里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但是他奈何现实不得,也只好借这种超越世俗、全身远祸的思想来自我解脱。冯衍的《显志赋》可说是表达汉代文人超越世俗之思的名作之一。

在表达由全身远祸到超越世俗的汉代骚体抒情诗中,张衡的《思玄赋》是最值得重视的作品。张衡出身世家,熟通儒家经典,史称他“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汉安帝听说张衡善术学,于是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这给他研究天文历法等科学提供了条件,“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汉顺帝阳嘉年间,他看到“政事渐损,权移于下”,就上疏陈事,建议“恩从上下,事依礼制”。他有感于自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皆好图讖,以至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于是就上书建议“收藏图讖,一禁绝之”。永和年中,出任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因为他的声誉与政绩,晚年征拜尚书。可见,张衡既是一个人品高尚的文人,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清官。

但即便是张衡这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文人,同样也会感受到从政的危险和生命的忧思,自扬雄时而发展起来的玄学在他这里有了进一步的推进,这比较典型地表现在他的《思玄赋》当中。这篇赋作于张衡任侍中之时,当时汉顺帝非常信任他,“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在赋中,张衡首先表达了自己高尚的追求与特立孤行的个性:“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感鸾鹭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并继而写道,自己并不担心这种高尚追求与世俗不合,而是怕以伪乱真,世人多僻,“彼无合其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览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于是自己通过占卜,开始上天入地的远游,去寻求精神之解脱。但远游最终的结果,却发现精神解脱之所并不在上下四方的外界,而在于自己的内心。“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嶮。”“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赋的最后,有系诗一首显明本意:

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祇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摇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跼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竭来从玄谟,获我所求夫何思!

人生短暂,河清难俟。与其为世事而烦恼,不如安定自己的内心,作一个淡泊名利、超越世俗的人,这就是《思玄赋》的基本主旨。此后,张衡又作《归田赋》,<sup>②</sup>进一步明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

① 冯衍之事与《显志赋》,均见《后汉书·冯衍列传》。

② 我们把张衡的《归田赋》看作是骚体抒情诗的变体,此处暂不论列。



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於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作品也值得关注,如传为贾谊的《惜誓》,感叹“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因而最后下决心向圣人学习,远离浊世,而决不肯与世人同流合污:“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虞犬羊?”严忌的《哀时命》开头先感叹生不逢时:“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时。”接着也表达了全身远祸的思想:“鸾凤翔於苍云兮,故矜缴而不能加,蛟龙潜於旋渊兮,身不挂於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侮辱之可为?”王褒的《九怀》有“览查查兮世惟,余惆怅兮何归。伤时俗兮溷乱,将奋翼兮高飞”之语。刘向的《九叹》在表达了“纷逢”、“离世”等愁苦之后,最后一叹也是远离世事:“升虚凌冥,沛浊浮清,入帝宫兮。摇翘奋羽,驰风骋雨,游无穷兮。”

从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激愤抒情,到感叹官场政治险恶、希望全身远祸的思想表达,再到扬雄、张衡等平静地看待祸福相依、荣辱共生的道理,追求超越世俗、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汉代骚体抒情诗中所表现的这种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它说明,处于封建极权制下的汉代人,他们虽有满腔济世拯民之志,但专制政治对于个体人格的压抑却使他们在仕途上倍受艰辛。于是,哀叹生不逢辰,感慨身世不平乃是其中大多数人的共同心理。但他们生当这样的社会之中,只要身在官场之间,就无所逃避这种残酷的政治角逐。因此,当他们看透了官场政治的腐朽与黑暗,厌恶了人与人之间有形无形的各种倾轧之后,全身远祸、超越世俗乃是他们思想的必然归宿。它同时说明,尽管汉代乃是把儒家思想奉为正宗的时代,但是由于封建专制对人的个体造成了严重的摧残和压抑,汉代文人的思想情感经过了一次大的历史的洗礼,终于初步悟出了一套结合《周易》、老庄与孔孟思想与一体的“玄学”哲学与“玄学”的人生态度,这对魏晋六朝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学者们往往认为玄学思潮兴起于魏晋,殊不知。早在西汉初年的贾谊,就对老庄思考有了深刻的思考。至扬雄把儒家思想、《周易》与老庄哲学融为一体,已经开后世玄学之先河,至张衡进一步将这一社会思潮向前推进,魏晋时代的玄学思潮,不过是顺其自然的发展而已。

### 三 行旅感怀与思念伤悼

汉代人骚体抒情诗第三个重要主题是抒写他们的行旅感怀、思念伤悼等各种人生的情怀。他们由最初的览古吊古,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东方朔的《七谏》等表达对屈原的怀念与同情,进而发展为抒写文人自己的行旅感伤,并成为汉代骚体抒情赋中的一大类别。这方面的作品以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为代表。

刘歆,字子骏,成帝时,与王莽同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同领校皇家秘书,后仕至光禄大夫。王莽篡位,任“国师”,封嘉新公。后怨王莽杀其第三子,与卫将军王涉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是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在西汉末年今古文学派的斗争中,刘歆曾受排挤,任外官。他的《遂初赋》即作于此,赋前有序曰:“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少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议论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

寄已意。”可见,刘歆写作此赋是在他被贬外放以后,抒行旅之感怀、写登临吊古之情是这篇赋的主旨。“过下廐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乐而情怠。”诗人经过下廐,不禁想起晋平公,他违背了君臣之义,不尊崇周天子,却浪费民力去修建行宫高台,纵情享乐。“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弃于家门。”晋国公室将衰,宗族枝叶先落,可是晋平公还怙恶不悛,把朝政丢给六卿处理。“载约屨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为履。宝砾石于庙堂兮,面隋和而不视。”他好坏不分,事非颠倒,委弃忠良,让奸臣当道。“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于铜鞮。”因为种下了公室衰落、大夫掌权的祸根,公室日渐衰微,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晋靖公被困于铜鞮而沦为家人。刘歆本为汉朝王室后裔,成帝时国运已经衰落。显然,当诗人策马于征途,路经故晋之域,登临吊古,想到历史上曾经发生了这些故事,再看看今日国家的现状,不能不感到万分的痛苦。

班彪,字叔皮,东汉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于西汉末年,二十岁左右逢天下大乱,避难于天水。后归附光武帝刘秀,举司隶茂才,拜徐令,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于官。他的《北征赋》作于避难天水之际。此赋开篇即言:“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从长安到天水一路,原是宗周故地,后归秦王朝所有,亦是戎狄出没之处,自己的祖先避难之所,行走于此,诗人自是百感交集:“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匏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豳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诗人先经过郇豳之地,那是周人的祖先公刘生活的地方,公刘因为讲仁爱之德,甚至泽及鸟兽。遥想公刘时代人民的幸福生活,看看今日的乱世;追昔抚今,天还是那个天,可是世道竟有这样大的不同,真有说不出的万般无奈。接着,作者又“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这令他想到了义渠王与宣太后通奸之乱,不禁对他们的狡猾与淫乱之行表示愤怒,赞赏秦昭王讨贼的义举:“仇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接着,作者经过泥阳,那是他的祖先班壹生活过的地方,想当年祖先在这里经营畜牧业致富,而如今祖庙已是一片荒凉,更是百感交集:“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再接下来经过安定,沿长城而行,让他想到了更多:“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而绥远,顾厚固以缮藩。首身分而不悟兮,犹数功而辞讟。”想那公子扶苏与蒙恬,为了秦国的长治久安,劳民伤财而筑长城,其实是在为秦国筑怨。岂知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辽远的蛮狄,而是秦王身边的赵高与胡亥。治国的正路不在于武力的征服,而在于以仁德抚远。可怜的蒙恬不懂得这个道理,临死前还在数说着自己的功劳。只有汉文帝采取的克让之策,才让南国的尉佗俯首称臣,并挫败了吴王濞的阴谋:“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佗于朝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幣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佗。降几杖于潘国兮,折吴濞于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年轻的班彪在北行避难的途中,就这样边走边做着思考:“揽余涕以于邑兮,哀民生之多故。”“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充盈其间,使这篇《北征赋》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结尾处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化解眼前的愁苦,体现了一名年青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屈的精神与开阔的胸怀,可谓汉代行旅感怀赋中的名作。

班昭,字惠班,班彪女,嫁曹世叔,早寡。班昭博学高才,常出入后宫,皇后妃嫔皆师事

之,号为曹大家。班固死后,她曾续修《汉书》。她的《东征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当时她的儿子新任陈留郡长垣县令,她随从前往,写下此赋。此亦行旅感怀之作。作者在开篇即言:“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悵而怀悲。”赋中先写她途中所经过的七个地方,中间多有历险,但均无细说,接下来写她经过平丘、长垣、蒲城等地,想到了孔子、子路、蘧瑗、季札等古代的贤人,仰慕他们的道德风采以及其不幸之遭遇,亦颇有感伤。不过,作者并没有就此而怨天尤人,而是由此想通一个道理:“知性命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此赋为作者自抒情怀,亦可以视为教诲其子而作。她上承其父班彪《北征赋》之精神,体现了一位儒家文人乐天知命、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作为一名女姓,有这样高尚的人生见识,实属难得,让人敬仰。

在东汉末年的行旅感伤抒情诗中,蔡邕的《述行赋》最有代表性。蔡邕,字伯喈,东汉著名文学家。曾因上书论朝政得失,为宦官所忌,几被杀,贬朔方。遇赦后,被权贵陷害,亡命江湖十二年。董卓专权,被迫出任侍御史,官左中郎将。董卓被诛,他闻讯叹息,被捕下狱而死。蔡邕的《述行赋》,作于汉桓帝延熹二年。据其自序所云,这一年秋天,汉顺帝梁皇后去世,汉桓帝与中常侍徐璜等五宦官诛杀梁冀,梁冀是汉顺帝梁皇后之兄,横暴专权,前后执政二十余年,徐璜等五人同日封侯,再度擅权。白马令李云上书直谏,触怒汉桓帝,将李云下狱杀死。当时上书救李云的大鸿胪陈蕃也被免官。在这种黑暗的朝廷形势下,徐璜把蔡邕善鼓琴的事情告诉朝廷,让他赴京,蔡邕不敢不来,行至途中,适逢有病而归。就在这种情况下,蔡邕写了此作。在作品中,作者首先以沿途所见而追想历史:

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夕宿余于大梁兮,消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甯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涂之复恶兮,陷夫人以大名。

作者在途中经过了战国时魏都大梁,在这里他想到了窃符救赵的故事,对晋鄙之死表示同情,对魏公子无忌和朱亥的行为表示愤慨。作者经春秋时的中牟旧城,想起了据城叛赵的佛肸,痛其不守臣节;而原为中牟农民的宁越却能够通过苦读而成为周威王的老师。作者经过圃田之地,向北境而远望,那本是卫康叔所封之地,不禁而怀念康叔的风采;过管邑时则想到了管叔、蔡叔,他们与卫康叔同为周武王之弟,却勾结纣子武庚而发动叛乱。经过汉高祖曾被项羽围困过的荥阳,凭吊脱刘邦于重围中的纪信。过虎牢关而想到了团结诸侯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对郑申公奢侈越制的行为表示批评。同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历史上的人物却有着如此不同的忠奸善恶之分,这不能不让作者心生感叹。由此而想到自己正要前往的京城,形势又是多么让人忧虑。“贵宠扇以弥炽兮,金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骜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得宠者气焰日益嚣张,全都在贪图私利而没有收敛。前面一批人刚刚覆灭,后面一伙人又接踵而至。他们动用种种能工巧思营造奢华的台榭,而百姓们却在湿地上露宿。他们用精美的粮食喂养禽兽,百姓们却只能吞吃糠粃。他们宽待纵容各种小人,对忠谏之士却给以严惩。有伊尹吕尚之才的人都被黜逐,有道之言却没有进献之门。由此可见。作者之述行,并不是述写自己的一路行踪,而是通过沿途所经之地生发对于历史的回想,并由此来表达

自己对现实的关心,抒写自己的满腔忧愤。面对这样的现实,自己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远离世事,回到自己的故乡去过那种平平安安的生活。“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拏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爱结纵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

以上几首行旅感怀之作,虽然在每个人的思想表达方面各有自己不同,但总的来说,借行旅以感怀世事,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关心,抒写自己的人生志向,是其基本主题。积极于仕途的奔波而又倍受各种艰辛,使汉代诗人在骚体抒情诗的个人思想情感表现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矛盾的心态。他们一方面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寻求退世远祸,另一方面又难以泯灭那颗关心国家的赤子之心,在感叹个人命运的同时仍然要抒发关心时政的情感。从个人遭际不平的角度讲,它上承《诗经·小雅·北山》的怨刺诗、《离骚》和《九辩》的传统,可以称之为“贤人失志之赋”,但是从情感表现方面讲,它既不同于《小雅·北山》的“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哀怨,不同于《离骚》怨楚王的昏庸和群小的谗害,也不同于《九辩》中的“贫士失职而不平”,而主要表现在封建极权制下文人士子的遭际命运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复杂思想心态。尽管个人的经历不同,在思想情感表现上也各有侧重,言辞或激烈或平和,篇幅或长或短,但大体上不出这一界域,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汉代骚体抒情诗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骚体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主要的抒情工具,因而,除了我们以上所论列的三大抒情主题之外,汉代文人们还充分发挥其在抒情方面的功能,抒写各种各样的人生之情。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武帝的《悼李夫人赋》和班婕妤的《自悼赋》,俱是感念伤怀的佳作,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贾谊在《旱云赋》里表达了对灾民的同情,对国家政治失中的不满。司马相如上《大人赋》对汉武帝好神仙之术进行微讽;《哀二世赋》批评其“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既是咏史,也是一种委婉的劝谏。王褒的《洞箫赋》虽为咏箫,但是把乐器的制作与音乐的演奏与仁义道德等相关联,在细腻的描写中同样有很浓的抒情诗味。梁竦的《悼骚赋》名为悼骚,实为咏史,借历史人物的命运寄托自己的愁思。班固的《幽通赋》在考察历史成败中表达了自己向圣贤学习的远大志向。张衡的《定情赋》抒男女之情。马融的《围棋赋》表面上写弈棋之法,其实是借以写人生之道,同样都是抒情色彩很强的作品。

#### 四 汉代骚体抒情诗主题的出现与文学史意义

笔者通过对汉代文人骚体抒情诗的主题进行概括分析,可以看出汉代文人骚体抒情诗的抒情主题既相对集中,又丰富多彩。遗憾的是,由于在当代人的文体观念中,往往把汉赋与汉诗看成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因而很多人在谈到汉代诗歌的时候,往往置这些作品于不顾,从而得出所谓“汉代诗人中衰”、“西汉时代没有文人诗”等结论。还有的人在汉赋进行观照的时候,只注意那些以歌功颂德的铺排描写为主的散体大赋,同样很少对这些以抒情为主的作品进行观照,从而否定汉代文人的自觉。如有的学者就说“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的”。

这种觉醒的。”<sup>①</sup>甚至还有的人则干脆认为汉代的文人没有个体意识,认为:“他们的创作是帝王心意的传声筒,揣摩主子的心思意态成了他们创作的惟一目标。这种毫无主体意识的创作,能有文学的独立可言吗?有可能写出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作品吗?”<sup>②</sup>在此,我们不仅有必要恢复这些骚体赋和拟楚辞的诗的身份和作者的诗人身份,确立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仔细分析汉代骚体抒情诗的三大主题——悲士不遇与生不逢时、全身远祸与超越世俗、行旅感怀与思念伤悼,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们体现了一种共同的倾向,即汉代文人对自己个体命运的极度关怀,它们是表现个体情感的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多的关心个体命运的诗篇。它们的产生,开创了中国文人诗歌的新时代。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点,需要我们将其与先秦的文人诗歌进行一些比较。追本溯源,中国后世的文人与文人诗歌传统,我们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源头。《诗经》中大小雅的作者,基本上可以认定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在大小雅创作中所抒发的情感,也对后世的文人创作有巨大的影响。“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别裁伪体亲风雅”,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的名言可以为证。但是从社会身份来讲,《诗经》时代的“文人”,包括屈原,却与汉以后的“文人”有着重大的不同。前者可以称之为“贵族文人”,后者则属于“平民文人”。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情感指向上的差异。以《大雅》和《小雅》为代表的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基本上是以面向群体为主的。其代表作如《大雅·抑》、《板》、《荡》、《小雅·雨无正》、《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这样的讽谏之作,关心国家政治的兴亡和民生的疾苦是其抒情诗歌的中心主题。《诗经》中当然也存在着象《小雅·北山》、《巷伯》这样表达个人怨愤、叹自身命运不公的作品,但是所占的比例很少,其中也缺乏对于个体人生道路的深入思考。其后,屈原在他的《离骚》、《九章》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楚国的忠贞不二,对君王的直言讽谏,就是对《诗经》雅颂精神的直接继承。但是把它和《大雅·抑》、《板》、《荡》等诗作相比可以看出,尽管屈原仍然把自己看作是楚国公族中的一员,对楚国君王和人民的忠贞使屈原最终以身殉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离骚》里却明显地把《诗经·大雅》中关注宗国的讽谏精神变成感叹个人哀怨的抒情。屈原在诗中一方面写出自己对君国的一片忠心,同时也着力突出了自己个人的品格节操,恨群小对自己的谗害,叹自己的命运不公。显然,这不仅是对《大雅·板》、《荡》精神,更进一步张扬了《小雅·北山》等诗篇的怨诽色彩。由《诗经·小雅》中萌生的贵族文人的个人哀怨之情,在这时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在屈原的思想情感中,面向宗族和国家的群体意识还是占有中心地位。这也就是屈原最终沉江的原因,是他在《离骚》等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主题。

平民文人作为一个群体而出现,应该是从战国时代兴起,到汉代,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最终确立而正式形成的。这些战国时代的平民文人群体一般被人们“士阶层”,这个士阶层的人大体上都是出身于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诸侯争雄的战国之际游说列国,寄希望得到升迁和重用,并不拘守于自己的宗族和国家,早已经淡化了西周封建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1 页。

② 李文初:《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8 页。

社会的宗法观念。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家臣,入秦后游说秦孝公而官至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也做了秦惠王的相;吴起本是卫国左氏人,先为鲁国的将,入魏任西河郡守,到楚被提为令尹;申不害原为郑国京人,韩昭侯启用其为相。即使是像孟子这样的儒家大师,为了推行自己的仁政主张,也不拘守邹鲁故国而去游说诸侯。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式之下,才会产生象宋玉这样的文士。从《九辩》中我们可以看出,宋玉和屈原不同,他不是楚王宗室,甚至也不是楚人。他在诗中自称“悲忧穷戚兮独处廊,有美一人兮心不悵。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这个自称“去乡离家”的远方游客,到楚国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用,自然会产生“贫士失职兮而志不平”的感叹。对个人命运的感伤,正表现了战国之际大批不得其志的游士们的共同情怀。宋玉的《九辩》在表面上似乎继承了《离骚》的传统,实际上其内在的主题却发生了极大的转换,由屈原从关心宗国命运出发来抒写个体感伤而变成了直接哀叹个人命运,把《诗经·小雅·北山》中感叹个人命运不公的主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到了极大的继承和发展。

两汉时代的骚体抒情诗,基本上继承了屈原抒写个人哀怨的一面,亦即宋玉《九辩》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建立起来后而兴起的汉代文士阶层,已经不再有如《大雅·板》、《荡》、《抑》的作者和屈原那样的贵族身份,自然也不会有像先秦诗人那样的贵族意识。他们都是在这个新兴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平民阶层,有着浓厚的平民意识,关心个人的生活命运,本来就是他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他们身处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社会里,希望通过读书仕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也改变自己的个体命运。但是,从一名普通的读书士子而爬上政治高位,对于绝大多数士人来讲,这条道路实在过于艰难。于是,悲士不遇、生不逢时,就是他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切肤的第一感受。即便是已经获得了自己希望的权位,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高枕无忧,皇权政治对人性的扭曲与官僚制度的冷漠无情,使他们同样需要面对各种磨难,常常会身不由己地陷入种种政治的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而形成了十分浓烈的个体生命焦虑,因而,全身远祸、超越世俗,又往往会成为这些文人士大夫所向往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痛苦与矛盾之中,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自然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感伤情绪和人生的悲剧意识,行旅感怀、思念伤悼,则正是他们这种感伤情绪得以抒发的有效途径之一。其实,这也正是汉代文人的个性觉醒。汉代文人并不是只会读圣贤之书而没有感情的一代,也并不是愚昧到连自己内心的痛苦都体会不到的个体人格的麻木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有着十分丰富的个人情感,是最早关注个体生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的文人群体,而且是最早以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识到皇权政治的残酷与官僚体制之无情的一代新人,正是他们把这种关注个体人生的切实感受写入骚体抒情诗中,并且典型地显现了后代封建文人所要共同面对的人生主题。张显了他们的独立人格与个体意识。在中国诗歌史上,骚体抒情诗因而具有开一代新风的重要意义。

(作者通讯地址:赵敏俐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100048)

(责任编辑 晓文)